

台灣推理小說的「在地性」實踐—— 以《美人捲珠簾》、《悲傷回憶書》之表現差異為討論範疇ⁱ 洪紱銘ⁱⁱ

摘要

1980 年代起，台灣推理小說朝向本土化發展，除了本土作家投入創作之外，其書寫的核心與敘事的軸線，也開始以「台灣」為主體，開展在地性的實踐。

2000 年後，「本格復興」的思潮漸起，雖然「台灣推理」的架構與以「台灣」作為敘事背景主體的創作趨向，仍然是推理在台灣發展歷程中明顯的特徵，但以「本格復興」為界的前後期作品，卻呈顯出「在地性」表現與實踐的差異，反映出不同推理世代對「本土」界義上的歧異，以及對推理小說中的「地方」的不同想像與建構。

本文將以台灣 1980 年代後第一本出版的本土推理長篇《美人捲珠簾》，與 2007 年獲得南瀛文學獎這個重要的地方文學獎首獎的《悲傷回憶書》兩部「本格復興」前、後的推理小說為討論範疇，以人文地理學中對「地方」的理論與本質探討，嘗試分析「在地性」實踐的差異，及其背後可能涵括的文學視域。

關鍵詞：台灣推理小說、本格復興、在地性、地方、本土、《美人捲珠簾》、《悲傷回憶書》

ⁱ 本文曾以〈台灣新本格推理小說的「在地」實踐——以《悲傷回憶書》為主的討論〉為題，發表於「2014 流轉中的華文文學學術論文研討會」(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2014 年 5 月 31 日)，本文之定稿蒙諸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寶貴的建議與修訂意見，謹在此致上謝意。

ⁱⁱ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生。

**The practice of locality in Taiwan mystery novels--
Take *Mei-ren Juan Zhu-liang* and *Bei-shan Hui-yi-shu*
for Example
Hung, Syu-Ming**

Abstract

In Taiwanese Mystery Novel, from 1980s localized development is the main direction; the core and writing axis of narrative has mainly based on "Taiwan" gradually.

A trend of reviving the lattice resoning rised from 2000, "Taiwan"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aiwanese Mystery Novel" still become an obvious fea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riting. However, these novels showe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ractice of locality, reflecting the disagreement of "local" in different generations, also had some different imagination of "place" and "region".

Taking two novels between 1984-2007 as example, the discussion in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explore how should Taiwanese mystery writing style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and "mystery", and analysising the Horizon in literature.

Key Words: Taiwanese Mystery Novel, A trend of reviving the lattice resoning, Locality, Place, Local, “Mei-ren Juan Zhu-liang”, “Bei-shan Hui-yi-shu”

一、前言

1970 年代後期，台灣推理因出版限制的鬆綁，而開始蓬勃發展，林白、星光、水牛、遠景等出版社陸續系統性地引進日本、歐美推理經典，其中林佛兒主導的「推理小說系列」與《推理》雜誌以及 1987 年起舉辦的「林佛兒推理小說獎」，成為當時本土作家發表推理創作的重要園地。

1980 年代起，台灣推理小說朝向本土化發展，有越來越多的本土作家投入創作，書寫的核心與敘事的軸線，也開始以「台灣」作為主體，開展推理敘事。林佛兒曾對此時期的推理創作之核心開宗明義地說：

推理小說反映時代、社會的各種複雜現象，它跟時代的節拍密切吻合，重視邏輯與理性。是新寫實文學的最佳表現途徑。就因為他強烈深入的寫實性，可以較諸其他文學更具「潛移默化，直指人心」的效果。¹

以寫實性的筆法，書寫時代、社會，進而落實社會意識與價值於推理敘事之中，在台灣推理發展的初期，已形成某種程度的典範意義。

2000 年後，部分台灣推理作家因對「第三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評選結果的不滿，特別是對評審們以「文學性」的美學標準，評選出的是「文學的推理」，而非「推理的文學」的反彈，因而引發了「本格復興」的思考與呼籲。

「本格復興」對推理小說創作回到保持著密室與解謎的「本格」²風格與傳

¹ 見《推理》第 23 期（1986.9），頁 10。

² 陳國偉曾引甲賀三郎對「本格」的定義：「不注重犯罪動機與犯人性格的描寫，主要關注於不可思議或經過精巧計畫的犯罪，其中科學的解答是閱讀樂趣的核心。」他認為解謎的過程和詭計的揭露，「知性」與「科學」是最重要的根基。見陳國偉，《越境與譯徑——當代台灣推理小說的身體翻譯與跨國生成》（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3），導論「身體作為方法——台灣推理小說的理論化可能」，頁 8-9。在當代台灣推理界最廣泛地被接納的「本格」定義，來自於島田莊司所言：「『本格推理小說』是指在故事的前半段展現具有魅力的謎題，並在故事進行到尾聲的過程中，利用理論的方式加以剖析、解說謎題的這種形式的小說。在進行剖析和說解的理論，因為具有一定的水準，為了和其他作品區分，才稱之為『本格』。」這段話特別凸顯了本格的重要特色，其一是其推理的模型，必然經歷「謎題／謎團」到「解謎過程」；其二是本格推理具有某種「本格的理論性」，殺人事件或是如孤島、暴風雪的山莊、別墅、密室、名偵探等

統的要求，造成對台灣推理界不少的衝擊與迴響，進一步導致台灣推理主流文學場域的重構。

然而，在典範轉移的歷程中，筆者發現即使在台灣推理新／舊世代的視域中，典範作品的類型、風格、書寫型態均有所差異，但在「台灣推理」的框架下，所有的作者都有意識地選擇了以「台灣」為地方主體的敘事背景。因此筆者認為「本格復興」前、後的「在地性」實踐存在承繼的關係，並可能補充當代推理文學場域對早期創作的回顧與認知，也提供台灣推理創作的未來想像，或許也能成為台灣推理小說朝向多元發展的基礎。

而本文意圖探究的是，雖然「台灣推理」的架構以及以「台灣」作為敘事背景主體的「規律」是台灣推理在地化歷程中顯而易見的特點，但以「本格復興」為界的前、後期作品，似乎呈顯出如何表現及實踐「在地性」的差異；這些作品內的差異，也反映出不同推理世代對「本土」界義上的歧異，以及對推理小說中的「地方」的不同想像與建構。

以此，本文擬以台灣 1980 年代後第一本出版的本土推理長篇³《美人捲珠

本格背景條件雖然不見得必須，卻仍然是辨識本格推理重要且關鍵的元素，因為這些元素容易營造或引起所謂本格推理的「氣氛」。見「島田老師對本格推理的定義」，第一屆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網站，網址：http://www.crown.com.tw/no22/SHIMADA/S1_a.html。(2014/9/28 作者讀取) 並見於後續幾屆徵獎網頁。因此，「本格推理」在島田莊司的理論中，大致上就是「能把犯人的推理、曖昧不清的事件順暢說明的小說」，即核心焦點在於「推理性」。見既晴採訪，〈島田莊司訪談錄〉，《皇冠》第 617 期（2005.7），頁 115-116。陳國偉認為台灣推理文壇在 2000 年後推行的「本格復興」，基本上綜合了島田莊司式的本格、古典推理解謎傳統、日本新本格等具有「明確的本格推理小說的審美標準」之創作表現與型態。見陳國偉，《越境與譯徑——當代台灣推理小說的身體翻譯與跨國生成》，第一章，〈跨國移動與知識譯寫——台灣推理文學場域的形塑與重構〉，頁 81；同見於陳國偉，《類型風景——戰後台灣大眾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頁 237。

³ 雖然林佛兒認為台灣 1980 年代以前發展斷裂的主因是「根本沒有國人創作的作品」，因此「本土」推理，至少應排除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日文創作，以及台灣古典文人的漢文寫作兩種淵源，即必須具備「在台」、「台人」以「現代中文」寫作等要素，才能取得台灣本土作家的身分，他們所創作的推理小說，始得稱為本土推理小說，也才能夠進入台灣推理小說的文學場域中討論。見林佛兒，〈四百年來一片空白——推理小說在台灣的困境〉，《推理》第 83 期（1991.9），頁 13。但不可忽略的是，台灣在日治初期，已有如李逸濤、魏清德、謝雪漁、陳蔚然等人於報刊上發表的古典中文推理小說，林熊生、葉步月等在台日人亦有推理創作，皆為台灣本土推理的源頭，不應排斥於台灣本土推理淵源與發展脈絡之外。呂淳鈺也指出偵探敘事在日治初期的台灣文學場域

簾》，與 2007 年獲得重要的地方文學獎「南瀛文學獎」首獎的《悲傷回憶書》兩部「本格復興」前後的推理小說為討論範疇，⁴並以人文地理學中對「地方」的理論與本質探討，嘗試分析「在地性」實踐的差異，及其背後可能涵括的文學視域。⁵

二、台灣推理小說的在地化發展歷程：

1993 年楊照評論推理小說在台灣的發展時認為：「台灣本土推理小說到目前為止成就還相當有限，尚未脫離觀摩學步的階段，既不曾形成鮮明的文類性格，也缺乏可辨識的流派傳承。」⁶他以余心樂、馬波的推理小說為例，指出異

上的發生與形成，具有一種新興通俗文類的移植與開展、深化與轉化的指涉意義，並與過去的種種文學創作傳統有所承繼，同時和當時台灣人們的精神生活、娛樂生活互有關聯。見呂淳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可見其重要的歷史意義。本文的研究範疇選擇《美人捲珠簾》與《悲傷回憶書》作為考察對象，主要是將研究視域聚焦於 1980 年代，乃至 2000 年後台灣推理小說的在地化實踐及其本土界義之差異。

⁴ 林佛兒主導林白出版社「推理小說系列」叢書、《推理雜誌》、林佛兒推理小說獎，使 1980-1990 年代的台灣推理文學場域，皆受到此權力結構下的典範價值影響，早期的本土推理作家如林崇漢、溫瑞安、杜文靖、葉桑、思婷、余心樂等推理創作，也一定程度的呼應著林佛兒所開啟的對「在地性」的探討；相似的是，2000 年後的台灣推理界，在「本格復興」的呼聲中，同樣由既晴主導了典範的重構，從「台灣推理俱樂部」、「人狼城推理文學獎」到「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其核心理念與價值，同樣深刻影響 2000 年後的推理創作。本文選擇《美人捲珠簾》與《悲傷回憶書》作為論文分析的文本，則是以其「獨特性」之意義，如《美人捲珠簾》作為台灣 1980 年代後首本出版的本土推理長篇，對於後起者所具有的示範性與標誌性意義；而《悲傷回憶書》亦是少見的以推理小說的型態，獲得非大眾小說獎首獎，且是極具有地方色彩的南瀛文學獎，同樣在當時代具有重要的意義。

⁵ 在地性的研究範圍廣泛，相關的研究主題，都會聚焦在台灣的歷史、文化發展歷程中，如何開展出具有主體性、特殊性的獨特展現。例如詹閔旭，《跨界地方認同政治：李永平小說（1968-1998）與台灣鄉土文學脈絡》（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7）、林宛儀，《王禎和小說語言的流動性與在地性》（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9）、何京津，《從「鄉土」到「在地」——論 90 年代以降新世代鄉土小說》（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力宏勳，《男同志的意象——台灣在地性的視野》（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皆嘗試探討文學作品中的在地性實踐與建構，以及如何與異文學、文化的互動，產生對應之關係。因此，於「在地性」的研究視野下，不僅能夠觀察出作者創作的時代背景及其所接受的文學場域之影響，亦可能從不同作品在地性表現的差異中，產生更多元的認識。

⁶ 楊照，〈「缺乏明確動機……」——評台灣本土推理小說〉，《文學的原像》（台北：聯合文學出

國風情、外來推理傳統模式的套用，模糊了台灣推理小說中的「本土焦點」。同時他將「關懷本土」視作建立文類「鮮明輪廓」的特殊性甚至主體性的重要途徑，因此即使他認為早期台灣推理小說的實踐尚不能抵抗「強大的歐美、日本陰影籠罩」⁷，但卻也正好反映出台灣推理持續朝向「本土」型態發展，並且建立「在自己的社會吸引一般大眾的重要資源、能力」⁸的期待。

本格復興後的評論者，如陳國偉也認為「歐美製造，日本加工，輸入台灣」的模式，表現出台灣的推理文壇，事實上與日本共同仿擬了歐美古典推理的美學傳統或法則。⁹楊照與陳國偉分別以1990年代與2000年後的視域，俱提出台灣推理小說因受到歐美、日本推理的深刻影響，致使其發展面臨限制，在這個發展困境與危機下，推理敘事與台灣地理環境和社會意識的緊密連結，恰好可能成為台灣推理內部對外來推理文學傳統的抵抗，即當推理敘事中強化台灣的本土特殊性，就能夠與外來推理產生意義本質的區隔，進而建立台灣推理的文類主體性。

如楊照所言：「如果本土作家寫的東西和翻譯的舶來品相距有限，是不是『本土』不就失去了其基本意義嗎？」¹⁰本土的基本意義，必須與「外來」者有明顯分野，始有必要稱作「本土」；而本土性的追求，在台灣推理小說的發展歷程中，也逐漸成為一種解決其發展困境的良方。

早期推理作家與評論家針對此議題所共同尋找的方案，是以「台灣」的地域性範疇為主，探索日常經驗，進而反映社會現實；¹¹通過地域性與社會性的

版社有限公司，1995），頁142。

⁷ 楊照，〈「缺乏明確動機……」——評台灣本土推理小說〉，《文學的原像》，頁144-145。

⁸ 楊照，〈「缺乏明確動機……」——評台灣本土推理小說〉，《文學的原像》，頁146。

⁹ 陳國偉，〈本土推理·百年孤寂——台灣推理小說發展概論〉，《文訊》第269期（2008.3），頁54。

¹⁰ 楊照，〈「缺乏明確動機……」——評台灣本土推理小說〉，《文學的原像》，頁144。

¹¹ 例如杜文靖自述《情繭》的中心意旨在於「透過一個破碎的家庭，一對堅強的姊妹花，把社會上層出不窮的愛恨故事做了鋪陳，也多少給賦了自我認定一些淺顯的愛的定義」，意圖透過他的記者身分，更深刻、透徹觀察社會問題，並且體現他的關懷。見杜文靖，〈走入大眾文學之路——「情繭」出版前的禱文〉，收入氏作《情繭》（台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頁6。傅博

結合，讓推理小說的場景能夠充分落實於台灣，因此形構了具有「台灣性」¹²的特殊風貌。

在這個層面上，小說情節中的推理、解謎過程，便不能夠完全獨立於台灣本土之外，即便故事場景可能被設定在異國異地，但其推理敘事，必然需要在適當的時機，回歸到對台灣當前社會現實與環境的反映或對照，試圖呈現探索和反省；也就是說，台灣推理小說的創作被期待具備「時代意義」，並且符合社會的脈動，因此不僅是敘事的背景需要揉合台灣的「地域性」與「社會性」，連案件的內容也必須與這些設定有關。

葉石濤評《美人捲珠簾》時，即已注意到這樣的現象，他指出：

它比任何台灣小說更直接的反應了八〇年代台灣的企業社會現狀，連帶地勾勒出韓國的政治制度、社會現況以及歷史和民族。我們常會在這本小說漫不經心的描寫中發現作者對台灣和韓國銳利的文化批評。這也許受到松本清張的社會風格頗濃厚的小說的真諦吧。¹³

這段評論，正好與林佛兒自覺地認為他的推理小說的主旨「就是要利用主題和故事，揭發社會黑暗的一面，把人性醜陋的隱藏的部分，也揭露出來，讓社會

評論《情蘭》時亦認為「以最大的同情描寫命運的無奈」，其最重要的意圖是透過推理敘事凸顯人性的善良與現實的殘酷的相會，所造成社會的悲劇。見島崎博，〈推理小說在台灣（下）〉，《推理》第25期（1986.11），頁52。傅博的看法受到黃鈞浩的支持，黃鈞浩認為《情蘭》的社會意識濃厚，且包含了「對台灣人悲慘命運的敘述」以及闡述「悲劇幕後的社會問題」，是當時極佳的創作典範。見〈寫實型本格派之創作典範——解剖台上的《情蘭》〉，《推理》第38期（1987.12），頁24。

¹² 邱貴芬認為「台灣性」牽涉在地色彩與特質，而且在地化在全球化的時代與脈絡下，與之對立的「在地」、「庶民」、「鄉鎮」將被表達為台灣性。她以鹿港為例，指出「台灣性」必須通過對空間的呈顯以及對地方的定義，尋索當地內部原先具有的特質，以及和其他地方互動的結果，進而由這樣的空間認知中，尋找「原鄉」，同時也因為這個原鄉的特質，讓鹿港得以代表台灣性的身分與地位。見〈尋找「台灣性」：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的基進政治意義〉，《中外文學》第32卷第4期（2003.9），頁46-47、48-49。本文所主張的「台灣性」形構，則必須同時服膺台灣的地域性範疇，以及以台灣為敘述主體的社會性書寫，意即「本土」與「台灣性」的連結，必然產生於「在地」情境及其實踐，因此「在地」的意涵亦同時包含了「地方」的地理範疇的描述，與記述個體或群體日常的社會寫實意義。

¹³ 葉石濤，〈評《美人捲珠簾》〉，《推理》第34期（1987.8），頁15。

儘快達到公道正義的境界，至少，要有一股和黑暗抗衡的光明力量。」¹⁴相互呼應，因為這個強烈的意識，使得《美人捲珠簾》著重於揭發人性真實與社會醜陋的面向。如小說除了寫丈夫葉青森「每每敷衍她，祇求在漢城能享受美妙的齊人之福」¹⁵，也寫妻子李玲「戀姦成熟，通姦害夫」所犯下的「又殺夫又害公公的通姦謀財案」¹⁶，這幾起謀殺案件背後的主要肇因，都來自於台灣的社會問題，即行兇動機不會只是人性純然的惡意，所有的詭計也不真的具有本格式的精巧設計，小說意圖反映的是具有台灣在地身分的葉青森，如何在異地韓國的生活體驗中，從本土／外來觀點的互動中，凸顯出無論是台灣政治情境、產業發展、經濟現狀、社會現實等具有在地性意義的本土面相，以及當時的人們如何在這樣的社會下生存的日常姿態。

然而，《悲傷回憶書》於 2007 年以本格推理小說的型態¹⁷獲得南瀛文學獎長篇小說獎，恰好反映出「本格復興」後關於推理小說與地方間關係的的思考轉向。

南瀛文學獎作為一個地方文學獎的徵件條件，雖然比較寬鬆地要求「作品主題只要與『台南縣』相關之人、事、物景，都在獎勵範圍內」，但其終極目標仍是「寄望每一吋土地之風俗、民情與景致，透過個人獨特風格之文學創作，

¹⁴ 林佛兒，〈我的推理小說之路〉，《文訊》第 270 期（2008.4），頁 80。這樣的看法，事實上統合了早期台灣推理小說創作的核心價值；另如溫瑞安認為推理小說於大眾文類中的優勢，在於能夠更進一步地「直接反映現代社會人性」、「反映時代與社會的各種問題」。見溫瑞安，〈序〉，收入氏作《殺人》（台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頁 4；以及思婷認為「推理小說原來也可以如此深刻地反映社會問題」的創作意圖等，都表現出相應的思考。見思婷，〈弄斧號子〉，《推理》第 45 期（1988.7），頁 145。

¹⁵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台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頁 96。

¹⁶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 292、293。

¹⁷ 《悲傷回憶書》中本格的被辨識，主要在其相當明顯的本格譯寫，其中尤以案發現場的陳述以及異域化鄉野空間的描述上。例如書中五個主要案發現場，及失蹤少女事件支線中的可疑犯罪現場中，每一個物品的排列位置與順序都被詳細記錄，而且其中必然存在著一個推展後續解謎的重要關鍵線索，成為作者刻意遺留的「提示（或混淆）」，以增加讀者與凶手之間對決的娛樂性。此外，在如「柳營」等鄉野空間描述中，一方面作者進行異域化的處理，將其導向某種「暴風雪山莊」的與世隔絕的情境，另一方面專注於書寫建築物內部機關、陳設的神秘難解的奇異性，都具有本格推理的色彩。

把土地的精髓與美感，傳達到每一位讀者心中」、「以多元書寫風格展現出台南縣多元的歷史、地理、人文與觀光的資訊。……執著於書寫土地情感的作家，透過文字了解本土的特色，也經由團體的激盪探究地方的內涵」¹⁸。也就是說，南瀛文學獎最終仍舊希望擇選出的小說創作，必須要一方面立基於在地經驗（土地之風俗、民情、景致、精髓、美感），另一方面必須呈現作為地方的某種獨特性（本土的特色、內涵）。

但翻閱評審意見，卻發現楊青矗對本書的評語是：「本篇發生地點為柳營的一處農場，而『柳營』兩字僅是台南縣一處地名而已，並沒有與台南縣風土民情融而為一。」¹⁹即他認為《悲傷回憶書》的台南實際上只是一個地名，並不具有連結在地經驗或本土獨特性的本質；換言之，雖然本書所有人、事、時、地、物及其事件發生條件雖皆在台南，但由於地理空間並沒有真實的連結到所謂風土民情的在地經驗，因而具有某種高度的「可替代性」，即「台南」可以輕易地換成另一個縣市，但敘事情節仍舊得以成立。

這種具「可替代性」的疑慮，事實上與人文地理學的地方理論運作相關。John Agnew 認為一個「地方」具有「區位」、「場所」、「地方感」三個基本面向，而區位概念與意義的判定與建立，是界定「空間」與「地方」具有不同意涵的重要方式。他指出我們現在時常將地方與空間兩個概念同質化，或者認為我們生活、生存的空間就是地方，這樣的觀念，實際上已經表現了人們所認知的「地方」，已經因其特殊性而從「空間」的概念中被區別出來。²⁰因此人建立區位的同時，將表現空間朝向地方轉變的過程，除了因為「區位」的概念與範圍是人所界定的之外，人們主動賦予客觀地理環境的主觀感受，基於人們的在地經驗與想像，使得空間逐漸具備某種特殊性與限制性，而趨近地方的意義。

¹⁸ 以上文句，分見蘇煥智，〈縣長序〉，收入林立坤，《悲傷回憶書》（新營：台南縣政府，2007），頁1；葉澤山，〈局長序〉，收入林立坤，《悲傷回憶書》，頁3、4。

¹⁹ 見林立坤，《悲傷回憶書》，頁324。

²⁰ 見 John Agnew, 'Space and Place', in J. Agnew and D. Livingstone ed. *The Sage 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London: Sage, 2011), p.316.

也就是說，當推理小說明確轉向以「台灣」這片土地或社會環境，認定或認可其中本土的成分時，雖然仍必須通過某些「特有」的物件或媒介，進而取得所謂的在地認同，但它衍生出雜揉對政治現實的焦慮與不安，即在「本土」必須等於「台灣」的論述中，隱含著同時對外及對內的某種劃界焦慮。

在這樣的討論脈絡中，南瀛文學獎因其特定的「地方性」，預設它的獲獎作品具有強烈的本土指涉，而對投稿作品而言，勢必也必須以在地性的實踐作為服膺徵稿條件的前提。然而楊青矗卻認為書中的地名並不明確地指涉真正的地方，意即這個「地名」所構築或召喚出的地理空間，具有「同質性」與「可替代性」的傾向與可能，凸顯出台灣推理小說於發展歷程中雖不斷朝向「本土推理」的型態發展，「台灣推理」的架構也一直是作家作品中的主體追求，當「本土」這個詞語開始必須被界義時，人與地方的關係，以及人在地方的在地經驗的呈現，也逐漸成為一種特殊的書寫方式；然而當「地方」在推理敘事中具替代性與變動性，是否仍舊能夠指涉出明確的地域性範疇與在地性意涵，在「本格復興」前、後作品的表現上即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差異。

三、浮動的「座標」——在地性的範圍：

人文地理學家對「地方」的概念進行定義時，在地性的生產暗示或催化了空間（place）轉為地方（location），如 Yi-Fu Tuan 的說法：「空間轉換成地方，地方獲得定義和意義。」²¹他認為空間到地方的轉換，以及地方所獲得的定義與意義，實際上包含了人們對於空間概念的描述，以及與地方親密的經驗兩個部分；而對於「在地性（locality）」的定義與詮解，Arjun Appadurai 指出在地性指稱的是各個不同的地方，如何因應外來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發展的勢力，因而在作業、製造、生活與習尚上，發展出各自有別的表達方式。²²也就

²¹ Yi-Fu Tuan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台北：國立編譯館，1999），頁 129。

²² 見 Arjun Appadurai: “*Globalization*”（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此

是說，在地性基於以「地方」為基礎的在地想像與資訊，透過本地的媒介重構而運作，因而體現了人與空間的親密關係，這層關係又可以更明確地指向人在空間中的日常經驗與情感依存，而空間因為在地性的生產，成為一個對人而言具有意義的「地方」。

因此，在地性的辨認來自於人與地方的關係，並取決於人對地方空間的使用與日常景態，在小說敘事當中，也可能直切的扣連了台灣本土文化的象徵與內涵，進一步劃歸出特定的地域範疇，使得文本內部在地性的探析，可以成為用以理解文本外部環境如當時社會現實景況、社經背景或關係的重要途徑，並且作為推理在台灣的在地化歷程的論據。本節以下將從「本土／異地」的觀點以及「本土」所涵涉的面向，進一步探論在地性的範圍及其於小說敘事中的實踐。

（一）本土／異地觀點下的地域性範疇

「本格復興」前，台灣推理小說經常通過異地來界定本土城市的意象與地方想像，進而從城市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衍生出更複雜的寓言關係，再回歸台灣本土的地域性範疇的討論。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透過本土與異地城市的辯證，嘗試取得獨特性或主體性，並證成其中對台灣本土的指涉，其中「外國人」的角色，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例證。

《美人捲珠簾》中受害者葉青森的日本同事阿部一郎，小說中對他的設定是：「我的中國話不行，葉老先生的日語講得很好，有很多語言上的困難，都是他幫我們溝通解決的。」²³並不斷強調他的日本國籍身分，如：「對不起，警部好像是你們日本人的用法，我就是這個分局的刑事組長，你就叫我宋組長好了。」²⁴也就是說，小說中非常刻意凸顯且區別了日本與台灣的國家與國籍，且在針對凶器的推論和說解上：「那把榔頭不是土產貨，木頭柄上烙有『日工』

據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出版社，2012），頁 153。

²³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 49。

²⁴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 142。

二字，是日本貨啦，你說一個普通家庭用的榔頭，是用個舶來品，不是很奇怪嗎？」²⁵警察對這個「日本」國籍的角色的疑心與敵對的態度表露無疑。而阿部在整個殺人詭計中，同樣也被塑造成一個被利用的角色，因為他的輕浮、色慾，被嫁禍甚至差點被定罪。

然而，這個日本與台灣國籍身分的對應，不僅只是表現出跨國戀情與跨國謀殺的文本複雜度，而是隱含了關於當時台灣、韓國、日本三地的複雜的歷史情境與經濟關係，即日本領先於台灣、韓國，而台灣、韓國彼此競爭的情勢，例如：

「我覺得我們漢城太窮了，內戰時期所受的創傷至今尚未恢復，要不然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更多……豈只地下鐵而已，我們想辦亞運、想辦奧運……我們有很多理想，唯一的理由，便是我們要生存、要進步，不進步，不突飛猛進，便會被我們的敵人消滅了……」²⁶

「據我所知，貴國向外國借貸了許多錢，在冬天，鄉下還會凍死人……」
朴仁淑很快地打斷他的話：

「這都沒錯，但我們一切都為了工業升級，躋身國際，我們是窮，但志不短！」……²⁷

這個段落，看似只是交代了台灣與韓國的關係，但「地下鐵」、「亞運」、「奧運」等敘述，卻皆以日本為對照；²⁸同時，「敵人」一詞，也明確指向了日本曾吞併朝鮮的國家恩怨與政治情仇。因此，台灣與韓國具有被日本統治的共同歷史情境，又存在著同處於東亞的經濟競合區域，彼此競逐的關係。

此外，朴大郎指責葉青森對朴仁淑始亂終棄時說：

²⁵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180。

²⁶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74。

²⁷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74。

²⁸ 《美人捲珠簾》出版之前，亞洲地區僅有1964年於日本東京舉辦過奧運，亦僅有1958年於日本東京舉辦過亞運，朴仁淑所言：「我們想辦亞運、想辦奧運」，明顯是以日本為對照、比較的對象。1986年9月南韓舉辦漢城亞運，1988年10月接續舉辦漢城奧運，完全符合小說中人物的話語和期待。

你結婚了！你結婚了還欺侮我妹妹，睡了她，你給我來日本人那套，以為一天一百美金就可以解決一切，你搞錯了……²⁹

或如宋組長的部下老高對阿部一郎的斥責：

因為你與死者有關係，我們一直要求你合作，你這個日本人，卻一直刁難我們。……³⁰

從這些對話來看，「日本人」這個指稱，明顯帶有韓國（朴大郎）與台灣（宋組長、老高）對日本（阿部一郎）的共同敵意；換言之，「日本」這個國籍與國家在小說中已經先行被預設了一種特殊的寓言型態，即必須被不斷衝撞、突破甚至打壓的對象，並且內化且深化了小說人物的形象。這樣的敘述，表現出強烈的國家意識，同時也透過對外／外國的凝視，回顧自身國家的本土形象與處境。

這種回顧，又透過葉青森的視角，反向地從城市間的差異，界定他對於台北的親近感或是認同。例如當他得知朴仁淑懷有身孕時，小說敘述道：

葉青森真是不忍心掃她的興，他的神思飛馳到亞熱帶的台灣故鄉，他的妻子李玲及小傑和小婷的影像，一一浮現在他的腦海裡。李玲癡癡地望著他，小傑和小婷直喊著爸爸……³¹

葉青森與朴仁淑的異地結合，及其「愛情結晶」基本上可以視為葉青森以外來者的身分，在異地漢城中最為完整的經驗實踐，但當他得知朴仁淑懷了自己的孩子時，卻絲毫沒有興奮雀躍之情，反而在心中感到「疑懼異常」，並且自認為面臨了「痛苦的取捨」；更進一步地，他開始想念故鄉——台灣、台北。

值得注意的是，整部小說中未敘寫葉青森在台北的在地經驗，使得讀者無法透過在地性連結地方本質與建構，「台北」的城市意象也產生了很大的空白；但是，當葉青森抵達異國異地漢城後，卻開始不斷重述他對台北的記憶，涵括

²⁹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 121。

³⁰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 179。

³¹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 70。

了他的重要經驗，即其取得在地認同的過程（如元配妻子、孩子、公司事業、經濟來源），更多的時候，是透過台北和漢城間看似共通的城市特性或景觀，尋找兩者間的不同差異，由異地而本土的觀點，補充了葉青森視角下的台北在地性。

無獨有偶地，《悲傷回憶書》也出現柳凌志本這個在霍川謀殺案中的重要關係人，小說對他的設定是：「是日本人沒錯。小時候就隨著父母親搬來台灣了，因此講了一口流利的國語。」³²在訊問的過程中，這個日本人同樣被不合理的懷疑，整體形象被形容成「油嘴滑舌」，同樣縱情於聲色酒樂，而被真正的兇手設計，一度被懷疑為殺人真兇。

兩部小說中，阿部一郎和柳凌志本兩位日本人的設定與描述雖然相似，但細部來看，阿部一郎在文本中具有暗示台、韓、日三地歷史情境、國際情勢以及人物國家認同的作用與意義，並且從這樣的對照關係中，反向地界定了「台灣」的地域性範疇；柳凌志本卻未被深化此種意涵，他在被初步排除嫌疑之後，即完全消失在推理敘事中，甚至在兇手自白時，這個名字也未曾出現，只能由讀者自行推敲他被誣陷的事實。

「本格復興」後，《悲傷回憶書》的敘寫似乎意圖運用「外籍」身分，增加小說情節的衝突性與戲劇性，如 Ramon 謀殺案中，受害者被殺害的原因全然是：「男人只會製造禍端，收後的卻都是女人。」³³「他也許在心裡沾沾自喜吧！以為女人都會臣服在他俊俏的外表之下而自己送上門。」³⁴可以發現這樣的書寫，比較偏向一種「純然敵對」的、一種復仇式的報復，殺害的是不是外國人變得不重要，因此更難以此對應台灣本土的地域範疇。

這種對「外籍」身分書寫的差異，顯示出兩部小說對本土界義的巨大落差。在「本格復興」的視域下，小說人物的國籍身分，成為一種附加的設定，即使

³² 林立坤，《悲傷回憶書》，頁 63。

³³ 林立坤，《悲傷回憶書》，頁 304。

³⁴ 林立坤，《悲傷回憶書》，頁 304。

每個不同的國籍對應著不盡相同的地理空間與範圍，但其本質上仍然具有「可替代性」，即不論柳凌志本、Ramon 實際上是哪個國籍，仍舊能夠以「外國人」作為統稱，也就是說，讀者無法辨識或定位「台灣」在這些外國之間的位置與關係，也自然失落了本土指涉的可能。

反觀《美人捲珠簾》結合歷史情境，透過人物對話表現他們的心理認同，建構出台灣與外地、外國的對應關係，指涉或界定出台灣本土的地域性範疇，這使得除了在台灣推理小說的文體形式朝向在地化的歷程發展，在推理敘事中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呼應。

(二)「本土」的地域性／社會性界義

早期台灣推理小說的發展，一方面受到外來推理敘事模式的深刻影響，³⁵另一方面則欲積極地朝向「本土」化，其創作實踐的表現，如傅博在第一屆「林佛兒推理小說獎」的「總評與建議」中指出「有生命的小說不要只憑空想，沒有把握的事，最好去查資料，或以自己的經驗為寫作範疇。」³⁶，他的看法應和了向陽所言：「涵蓋『多學廣識』、人的生活、生存與生命的探討」³⁷對台灣大眾文學建立的期待，更重要的是這段話在基於「本著使推理小說能在台灣發皇的期待」³⁸，讓新聞性與社會性話題，以及推理成分與社會意識的結合，成為一種特定的典範意義。

第二屆小說獎評審意見的結論中，提及本土的社會事件結合作者自身經歷

³⁵ 如傅博指出：「各篇我認為創作手法還很幼稚，尤其詭計的使用很古老，有的一百年前就有人用過，普遍缺乏創新。」或如景翔針對〈密室疑雲〉指出：「密室的設計與解開均無新意，不過整個結構顯得單純。」以及「總評與建議」中指出：「大部分作品都是二次大戰前的寫作方式，密室，錄音帶的使用太過陳舊了，既然小說是創作就應該要創新，推理小說也不例外。」見〈第一屆林佛兒推理小說創作獎總評會議〉，收入思婷等著，《林佛兒推理小說獎作品集 1》（台北：林白出版社，1989），頁 209、210、213。

³⁶ 〈第一屆林佛兒推理小說創作獎總評會議〉，收入思婷等著，《林佛兒推理小說獎作品集 1》，頁 214。

³⁷ 見向陽，〈推之，理之，定位之——序林崇漢推理小說集「收藏家的情人」〉，收入林崇漢，《收藏家的情人》（台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頁 16。

³⁸ 〈第一屆林佛兒推理小說創作獎總評會議〉，收入思婷等著，《林佛兒推理小說獎作品集 1》，頁 214。

的特色，³⁹表現出社會性與在地化之間的可能連結，而推理敘事中反映當前社會的「實景」，雙向地回應了「在本地紮根」的文體發展期待以及讀者的熟悉感與認同感；同時，因為社會性與在地化兩者充分扣連，因此為了避免「空泛的皮相」⁴⁰，推理敘事更必須導向「反映現實」，包含人物個性的設定、小說場景的描寫、情節對話的語言等，都強調作者個人的「體驗」與「經驗」。

葉石濤曾認為《美人捲珠簾》於台灣推理小說發展史中具備的重要意義，在於即使寫作手法可能受到外國作家影響，其內容也出現異地色彩，但這部小說的「精神」卻是道地的「台灣」的產物，推理敘事具有與「台灣」地理環境與社會現實的密切連結，並藉以區隔外來推理作品，具體定位「『台灣』推理」的位置⁴¹，意即「本土」的界義，勢必同時牽涉「台灣」的地域性範疇，以及以「台灣」為主體的社會性描寫。

社會現實與意識，通常可藉由對社會事件的描述與詮釋體現，《美人捲珠簾》的敘事情節，在宋組長推理、解謎的過程中呈顯了社會事件的寫實意義。例如在葉丹青與紅杏命案中，宋組長遞交地檢署的「移送書」寫道：

黃種由於貪圖葉丹青的錢財，介紹老人茶室的紅杏給葉丹青，設計騙財，事發當時，紅杏恐嚇葉丹青要五百萬元，二人為此爭吵、打架，黃種在場起初作壁上觀，後來鬧出人命，他以此作為要脅，要從葉丹青那裡得到好處，他把這個事件看成一個挖掘不完的活泉源，為了討好葉丹青，他幫他把現場搞得凌亂不堪，引導警方步入強盜殺人的陷阱，因此黃種難脫幫助殺人的罪嫌。⁴²

小說對位於迪化街的「老人茶室」、紅杏陳屍的林森北路、錦州街一帶的住處、

³⁹ 見〈第二屆林佛兒推理小說創作獎總評會議〉，收入余心樂等著，《林佛兒推理小說獎作品集2》（台北：林白出版社，1990），頁270。

⁴⁰ 見〈第二屆林佛兒推理小說創作獎總評會議〉，收入余心樂等著，《林佛兒推理小說獎作品集2》，頁270。

⁴¹ 葉石濤，〈評《美人捲珠簾》〉，《推理》第34期，頁15。

⁴²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241-242。

葉青森陳屍的天母住處等場所，皆具有其地理環境特性，以及與這些人的日常性連結，因而圈限出了具本土意義的地域範疇；同時，移送書詳細的記述殺機的起因、案件發生的經過、兇手對警方偵查的誤導等等，事實上俱與對情慾與錢財的「貪婪」有關。這種取材自當時台灣社會的書寫型態，也容易召喚出相近的閱讀情境。

除此之外，「新聞」是一種非常容易召喚大眾共同的在地經驗或記憶的方式，尤其是重大的社會案件，在經過媒體的大幅報導後，很可能成為一種普遍的印象。《悲傷回憶書》經常以「新聞」報導的記錄作為小說中當時社會的顯現，新聞報導置入推理小說之中，使情節中人與地方的地緣關係，將構成在地想像，凝聚「在地性」。例如每一場謀殺案與失蹤案之間，皆由新聞報導串接，例如：

台南縣治安惡化，人人惶恐難安。連續殺人魔暗處覬覦獵物，生吞心臟，烙下戰利品標記。RE、B，下一個會是什麼？

噩夢！男人膽寒、女人心悸！

連續殺人魔嗜殺成癖。台南縣一個多月內四名少女失蹤，至今仍無下落，凶多吉少。連續殺人魔精神錯亂，男女盡遭毒手，受害者持續增加中。撒旦果真回來懲罰人類了嗎？下一個會不會是你？連續殺人魔已成了人人心中最恐懼的心魔。⁴³

這些新聞報導皆明確地將事件發生的「地方」指向台南縣，意圖增加「在地」的真實性，而且這些小說中的新聞都能與真實的社會事件有著某種程度上的關聯。⁴⁴

此外，這些新聞並不具有破案線索或關鍵的價值，而是偏向一種客觀的「報導」，在此其中沒有什麼與案情直接相關的線索，真正的用意，也不是提供警

⁴³ 林立坤，《悲傷回憶書》，頁 109。

⁴⁴ 例如 1984 年的徐東志連續殺人事件中的殘殺手法、1986 年的楊丁傳綁架撕票案中的移動足跡、2000 年盧正綁架撕票案的地理空間等，這些案件都在當時曾有大篇幅報導的實際案例，不無可能成為《悲傷回憶書》中的參考對象。

察或偵探推理或辦案的方向，反而是表現或回應當時社會大眾的情緒與聲音；例如小說對偵探羽泉的身世記載：

「謎一般的命案」發生在一九九八年。一九九八年發生憶起驚動全國的滅門血案！當初滅門血案幸運逃過一劫的就是青年，青年的家屬完全遭到殺害。⁴⁵

這段記述，明確地將 1998 年的林口滅門血案和推理敘事相互串聯，此書寫策略，加強故事情節本身與台灣地理空間的連結，避免虛構的想像造成在地性失落的隱憂。

這樣的地域連結，自然更為強烈的將小說情節與社會現實鏈結，並且藉此表明這樣的案件，並不是憑空杜撰想像，而是可能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的，社會意識通過地域關係的方式呈顯在小說之中；換言之，真實的新聞事件和小說剪裁的新聞之間最密切的關係，在於「地域」的相似性上，即殺害的手法可能不盡相同，但案發地點通常被設定在台南郊區，或更為偏遠的鄉間，而兇嫌不論是意圖毀屍、棄屍或勒贖、取款的行跡路線，必然途經台南市區，從推理敘事的安排來看，透過地域關係確實得以聯繫小說與新聞的虛實關係；《美人捲珠簾》中的新聞報導事實上並沒有被強化這樣的意義，例如葉青森命案中，「城南警署透過報界，登出死者相片和他的特徵，以及命案的可能性。」⁴⁶而朴仁淑也是「直到前些天報紙登了葉青森死亡的照片」⁴⁷才驚覺發生命案，意即這些報導完全僅是推動情節的某種元件，真正的在地性實踐，則是通過偵探的實地探查、描述社會事件的過程顯現。

然而，《悲傷回憶書》中的新聞報導，雖可能召喚出當時某些集體、共同的記憶，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剪裁卻很難真正凸顯「在地」的特性，即作者雖然強化了推理敘事與地域性範疇的關聯，使得情節發展看似緊扣著「台南」，

⁴⁵ 林立坤，《悲傷回憶書》，頁 111。

⁴⁶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 260。

⁴⁷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 277。

但因文本中的人與地方的連結性不高，導致這個地域性範疇具有可替代的彈性，即如楊青矗指出「柳營僅是台南縣的一個地名」的憂慮；這種弔詭，事實上反映出「本格復興」後台灣推理文學對「本土」的界義，已逐漸不以「地域性」作為「台灣本土」的表現途徑。⁴⁸

四、出／入「場所」——在地圖像的建構：

早期地理學者 Edward Relph 指出人們嘗試理解地方現象的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人們在意與自己相關的一切，特別像是各種作為體現生活、體現世界的基本表述形式，其二是增進對地理環境的知識，有助於保存與操作既存的地方以及被創造出的新地方間有形與無形的特質，⁴⁹例如景觀、建築、歷史、文化等。

值得注意的是，Relph 在談論這個獨特的區域時，仍然使用「Place」一詞概括，主要是為了釐清地方究竟具有何種獨特的身分或特性（identity），而人們在這個地方中的表述與體現的同時，也展示或確立了自我的身分，從這樣的交互關係中，得以展現某種人對該地的認知或認同；相較之下，Agnew 則比較明確地界定場所為日常生活具體發生的場域，他指出一旦人們以場所的概念來思考地方時，這個「地方」除了包含了區位所指涉地理環境的相對關係外，還涵括了社會生活與社會環境可能的改變，他以辦公室、家、購物中心、教堂、車輛為例，說明這些空間之所以被定義為場所，原因在於透過社交關係，這些空間可能使人建立自我的價值觀、態度與表現的行為。⁵⁰Tim Cresswell 則進一

⁴⁸ 事實上，「本格復興」後的許多台灣推理小說，都呈現出相當類似的書寫型態，例如冷言，《鎧甲館事件》（台北：泰電電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中鎧甲館所在的九份；既晴，《病態》（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中的北投區舊式湯屋、既晴，《超能殺人基因》（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5）的埔里；陳嘉振《布袋戲殺人事件》（台北：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中作為主場景的新豐大樓等，實際上都淡化了台灣本土的地域性色彩，而專注於某些足以反映現實世界的闡述或創造，顯現不同於早期台灣推理的在地性思維。

⁴⁹ 見 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p.44.

⁵⁰ 見 John Agnew, 'Space and Place', in J. Agnew and D. Livingstone ed. *The Sage Handbook of*

步解釋並認為如果區位是一個比較單純的地理觀念，指涉的是一個被特定標示的地區和範圍，那麼「場所」將是社會關係的物質環境，也是一個較為真實的地方樣貌。⁵¹

以此，當「日常」作為個體經驗與群體關係的基礎，而「場所」是地方的基本內涵之一，那麼在小說敘事中，場所的建構所顯示出人與人、人與空間之間的互動，也表現出在地性的建構。本節以下將從「鄉野空間」與「城市地圖」兩個面向，觀察文本中人物出／入「場所」的足跡，探究「本格復興」前後作品所呈顯出的差異。

（一）鄉野空間的想像

《悲傷回憶書》特別敘寫兇手薇琪姐的位於「柳營」的住宅：

柳營農場海拔雖不高，不過面積廣闊，範圍不小，許多山莊就搭蓋在半山腰上。……向當地住戶詢問過後，得知左方山頂上單獨一間華麗的建築物就是他們的目的地。……屋內以淺薔薇色為主色，壁磚是以幾何圖形拼貼而成，金箔手工描邊。家具與擺設雖是現代化設計，卻融合歐洲中古時期古堡式風格。整個空間給人時空交錯的幻覺，隱隱襯托出屋主的不平凡。⁵²

《悲傷回憶書》作為「復興本格」號召下的台灣推理小說，被認為具有「本格派推理並不是獨立於台灣地理空間之外，而是建築物內部的空間和設計往往被認定是事件主要的發生場域」⁵³的特徵，因此，小說敘述中雖明確指出故事背景的地理範圍與地方座標為「柳營」，但實際上更專注於刻劃建築物內部的空間；相較之下，「柳營」的區位特性相對薄弱，也幾乎無法召喚任何的日常生活經驗。另外，「柳營農場」也被預設在：「到了午夜，商家歇業，邊關的荒郊

Geographical Knowledge, p.326.

⁵¹ 見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 15。

⁵² 林立坤，《悲傷回憶書》，頁 262。

⁵³ 陳國偉，《越境與譯徑——當代台灣推理小說的身體翻譯與跨國生成》，頁 222。

只剩萬籟俱寂。山林野間稀少住家燈光微微將山的稜線勾勒出，風吹過，樹被月華映射出的殘像不真實地妝點著黑暗角落」⁵⁴的鄉野空間，同樣被作家賦予了某種異域化的意涵，即這些自然鄉土是「被恐懼」的，因為它的偏遠和異常，使得鄉野空間成為某種「死亡地景」的象徵。⁵⁵

《美人捲珠簾》中位於台北市天母葉宅，也有相似的描寫：

下午的陽光軟軟地照在天母這條臨山腳的巷弄裡，顯得特別安詳和寧靜。從紅色大門深掩，圍牆爬著綠色植物、充滿樸質美的外表來看，實在看不出這是幢屋主已遭意外的一座凶宅。⁵⁶

李玲的房間是主臥室，……一組原色木頭組合的床具及衣櫥，顯得古樸自然，窗前擺了兩隻籐製沙發，坐墊的花色很鮮豔，……發現這間房收拾得很乾淨，深得幾乎是黑色的床單，很整齊地覆蓋在床上，一切收拾得井然有序。而紅色絲絨的窗簾，拉得滿滿的，……大概有一丈長的木窗子，嵌成一尺四方的小木框，框裡的玻璃磨邊，顯得很歐式。……羊毛地毯是歐洲古典的花式，有大紅大紫的圖案，床前還鋪著一塊三尺寬二尺長織成熊貓的羊皮。⁵⁷

李玲的房間擺置，與其建築空間位於的城市位置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落差。天母葉宅位於「狹窄」、「偏遠」的「巷弄裡」，更被強化了寧靜、質樸的意象，但她的房間卻充滿了華麗的物件，例如「原木木頭」、「籐製沙發與鮮豔的坐墊」、「紅色絲絨窗簾」、「歐式古典花紋的羊毛墊」、「羊皮」等等，對反了這個建築物外部的意象，並且也和「臨山腳」、「安詳」、「質樸美」的敘述有著不小的差異。

然而，《美人捲珠簾》與《悲傷回憶書》對於建築物、場所的設計與敘寫的表現差異，在於《悲傷回憶書》刻意營造出某種被恐懼的鄉土環境，以呼應

⁵⁴ 林立坤，《悲傷回憶書》，頁 52。

⁵⁵ 見陳國偉，《越境與譯徑——當代台灣推理小說的身體翻譯與跨國生成》，頁 219。

⁵⁶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 161。

⁵⁷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 165、166。

小說情節中的神祕難解的推理敘事，同時對屋內擺設的詳細描寫，目的也在於凸顯出屋主薇琪姐的「不平凡」，意即作者以建築物為核心，以其內、外的環境樣態與樣貌，增強敘事的「詭奇」；《美人捲珠簾》雖有相似的敘述，但其建築物內部與外在城市環境的落差，是為了連結城市中的個體對地方認同的價值選擇，如宋組長察看天母葉宅的各個房間後所興發的感嘆：

宋組長看著看著，忘了他是來辦案的，他真是羨慕這個家庭，他想著自己的三個兒子，擠在一間三坪大的鴿子籠裡，睡上下舖、共用桌子，常常吵得不可開交的景象。⁵⁸

他在調查建築物內部空間的同時，回憶起自己家中的景況，包括「三坪大」、「鴿子籠」、「上下舖」、「共用桌子」等等描述，反而應和了天母葉宅的外部「狹窄」的環境樣貌；然而，當宋組長結束調查後返家，再次觀看了狹窄紛亂的家裡的景象之後，他卻感到：「那樣的景象，看起來也是滿溫暖的。」⁵⁹進一步地說明城市空間的特性雖然會改變人處於該空間的方式、姿態與位置，但是在使用城市空間的過程中，人們的經驗會進一步與地方內涵相互扣連，而生產出個體的在地認同，使得這些場所在小說敘事的過程中，被賦予在地性的意義。

兩部小說表現出的在地性實踐的差異，仍然回到對「本土」的地域性範疇的思考。《美人捲珠簾》中的場所及其敘寫，展現人們的日常經驗必然與空間的形構產生連結，因此回應了從空間轉向地方的過程中，人與地方的互動關係；《悲傷回憶書》則明顯地將場所置放於一個鄉野空間中，相應的描寫以塑造小說氛圍或推動解謎的進行為主，反而弱化了人物與地方之間的關聯，同時也讓「柳營」這個地名產生了可替代性。

（二）城市地圖的建構

除了對鄉野空間的想像與敘寫之外，台灣推理小說的「在地」書寫，經常通過看似與故事情節平行的城市觀察與記錄，展現對地方的描述與關懷。其中

⁵⁸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165。

⁵⁹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212。

又以偵探或警察在城市的足跡為最重要的形式。

David Schmid 認為偵探小說的空間永遠是偵探小說文本整合的部分，因為偵探必須鑽研其所在場景並深思這些城市的空間或物件的象徵意義，以便了解與破案；⁶⁰Mike Crang 也認為偵探在文本中被設定為都市生活的詮釋者，讓城市空間變得清晰易解，⁶¹也就是說，推理小說中的城市敘寫，雖然不見得是主要敘述的對象，但偵探解謎的過程，勢必與其在城市的移動有關，都市生活的經驗，以及對城市的詮釋，都可能透過偵探的所見所感具體呈現；例如《悲傷回憶書》中，偵探羽泉和警察伊古曼在調查失蹤少女事件時，以台南市的街道為座標（並且製成地圖展示給讀者），勾勒出被害少女的失蹤路線，並進行相關的調查，例如「水溝路」：

這算是條暗巷，剛好在這條骯髒的大水溝前，因為寬度太窄，大型車輛沒辦法進來，只能容摩托車跟人通過。……水溝的另一邊後方完全是塊荒蕪的土地，長滿雜草，空地前方看來即將興建大型建築物，購物中心之類的，工程進度只完工一半。⁶²

又如「小東路」：

「車站離這一條小東路不是很近嗎？」

「不遠，過了一條街就到了。」伊古曼指給他看。

兩人站在小東路與前鋒路交叉口。

「你看，麥當勞就在那裡，你看到很大的 M 招牌吧？」

「這附近到了晚上不是很熱鬧？」

「是的，這是著名的鬧區，人車絡繹不絕。」⁶³

⁶⁰ 見 David Schmid, 'Imagining Safe Urban Space: The Contribution of Detective Fiction to Radical Geography', *Antipode*, 27(3), 1995, pp.245-246.

⁶¹ 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Culture Geography)（台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68。

⁶² 林立坤，《悲傷回憶書》，頁 127。

⁶³ 林立坤，《悲傷回憶書》，頁 130。

或如調查第三件謀殺案時他們來到的「成功大學」：

車子在一條環境幽靜，似乎剛完工沒多久的住宅區停下。有些房屋甚至還無人居住，空空如也。⁶⁴

偵探這個角色在經由行走的過程，透過街道名的定位，勾劃出當時台南的發展景況，例如即使在熱鬧的市區中，仍有像是「水溝路」一般骯髒濁亂，並且發展停滯的區域，進而對比出車站附近的「小東路」、「前鋒路」的繁榮，有跨國速食餐廳「麥當勞」的進駐，更成為一種現代的、進步的象徵和指標；但同時在車站附近的成功大學，卻依然存在著廉價的住宅區域，展現出城市的多元面貌，也成為某種形式的在地實踐，再被形塑為當時社會的具體縮影。回到小說情節中，這些又同時是案件發生的具體場景，以及謀殺背後人與人間複雜關係的場域。

也就是說，這樣的觀察被寫入小說當中，即使並非解謎的重點，但仍舊保存了某一段城市發展中的重要歷程，而這個歷程可能作為讀者重現在地記憶的基礎，進而呈顯出本土的精神與獨特性。

不過，在其在地性實踐中，仍可以發現「推理」和「地方」被刻意連結的形態，因為不論新聞或是人的行跡，在整個推理敘事中，既沒有推動情節發展的效用，也不是被著力描寫的部分（推動與被詳述的部分，反而是譯寫本格的那一塊），最重要的作用，其實在於意圖建立整個小說和台南這個地方的關係，並且表明事件發生的實際地點而已。因此，《悲傷回憶書》所造成的懸疑，在於小說敘事雖扣連了地方，卻失落了對這個地方的指涉，以致於最重要的地域範圍「台南」，似乎可以置換成任何一處也是台灣的城市。例如城市足跡的部分：

他憑著曾有過的印象以及多次詢問路人後找到了他的目標。這是在市立醫院附近的一座社區。在行經市立醫院途中經過崇明國小，他從車窗外

⁶⁴ 林立坤，《悲傷回憶書》，頁 226。

眺望泛著這座樸實溫馨的建築，他小學曾轉學至此，因此有過一年的依稀記憶。⁶⁵

這段敘述固然是人在城市中的足跡，並且依其真實體驗而產生對地方或地理空間的依繫情感，但「市立醫院」、「崇明國小」都能夠輕易地置換成其他城市的醫院及其附近的國小，顯然這樣的地理空間存在著可替代的彈性；而在形式上，這樣的地理空間原本意圖以「在地」連結地方內涵的「本土特殊性」，而實際上卻成為推理小說的附加與妝點。

再看失蹤少女事件所發生的場域：水溝路、暗巷與旺福館的位置關係：

他們蹲著的位置（暗巷）是旺福館後方偏右的方位，自己竟然被血跡流動路線給誤導了。他這才注意到自己忽略了一點，旺福館的後門是在後方偏左的方位，也就是他們再往前走個十步，就是旺福館後門所在。⁶⁶

在這段敘述中可以發現，案發現場的暗巷，與滅跡地點的旺福館之間，並不具強烈的聯繫，主要依賴的是偵探（作者）個人主觀的觀察（設定），這也表示推理小說中的地理空間與地緣環境始終不是被敘述的重點，進而難以清楚地指涉「本土」的風土、民情、社會與時代性，更進一步地說，這種「本格復興」後常見的書寫類型，因喪失了清晰的本土指涉，連帶使得「台灣」在推理敘事中逐漸喪失了其主體性。

反觀「本格復興」前台灣推理小說的城市地圖與偵探足跡，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考與書寫模式。例如《美人捲珠簾》中宋組長為了破解謎團，而搭乘計程車來到台北橋下的有緻茶室。小說寫道：

車子從重慶北路轉入民權西路的慢車道，進入台北大橋下。計程車在橋下臨時工人聚集區轉了一圈，駛入狹窄的迪化街。不久，有緻茶室的市招就映入宋組長的眼簾。計程車在離有緻茶室還有五、六個店門口的地方找個空位倒車停妥。……穿過騎樓下一些橫七豎八的機車和雜物，到

⁶⁵ 林立坤，《悲傷回憶書》，頁 159。

⁶⁶ 林立坤，《悲傷回憶書》，頁 176。

了有緻茶室。⁶⁷

這條車行的路線凸顯了兩個與場所及其在地性密切相關的兩個關鍵訊息。其一，從「為什麼要右轉民權西路？」的問題作為開展，從台北市的交通地圖來看，直行重慶北路至南京西路後右轉進入迪化街，除了只需要在南京西路口右轉一次外，整體的路程不僅縮短，還可以避免「駛入狹窄的迪化街」，但是宋組長一行人乘車卻不走這條比較便利的路線，反而刻意挑選了難以通行的道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帶出「台北橋」及「橋下臨時工人聚集區」的景觀。

從史料⁶⁸記載來看，《美人捲珠簾》發表時，迪化街的拓寬案仍未完全中止，而作者特意安排宋組長等人從台北橋下進入迪化街一段，即具有歷史記憶與圖像見證之意義；具體地說，迪化街一、二段在建街到發展的沿革中，具有明顯的分界，大稻埕的核心即在台北橋以南，特別是在民生西路到台北橋之間，小說中的人物因為推理、解謎的過程，必須要進入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場所時，需要一個明確、清楚的物件進行指向，才能表顯地方的在地意義，繞行台北橋下再由區分的界線進入發展的核心區域，某種程度上也對迪化街的歷史進行了一次巡禮。

此外，騎樓下雜亂的機車與雜物象徵的日常景態，也來自於不敷使用的「狹窄」意象，因此「臨時工人聚集區」更清楚地指出迪化街可能歷經的拓寬沿革；

⁶⁷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頁148。

⁶⁸ 迪化街一、二段為大稻埕最早的街肆，其建街的歷史最早可溯自1851年，從日據時期到光復後，迪化街的發展都以台北橋為界，以南為發展商業為主，為大稻埕的核心區域，以北是通往大龍峒的必經道路，都市發展以住宅區為主。參自黃淑清編，《台北市路街史》（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85），頁270-274；趙莒玲，《台北城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3），頁25-37；湯熙勇主編，《台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2），頁191-193。此外，黃淑清編，《台北市路街史》記載了道路鋪設的歷史：「台北橋以南寬六點六公尺，柏油路面，以北為石子路面，嗣後全面改鋪柏油，一段亦經路面改善，拓寬為八公尺。」再三強調迪化街一、二段俱以台北橋為分界，且發展以南優先於北的趨勢。見黃淑清編，《台北市路街史》，頁273。另外，「狹窄的迪化街」描寫的是從光復後至今迪化街路面仍舊維持著八公尺的寬度，1977年台北市政府曾核定「變更迪化街寬度案」，希望將路面進一步拓寬至二十公尺，但因牽涉到古蹟文化存廢的問題，該案已於1995年中止。參見台北市政府，〈府工二字第43828號〉，1977年10月18日。

也就是說，在前往迪化街的過程中，非必要但卻特意途經了「台北橋」、「臨時工人聚集區」，即在確立在地性的同時，也保存了歷史敘述，使得讀者進而得以趨近地方。

其二，這一條車行的路線，說明在小說寫成時，迪化街尚未明訂改為單行道⁶⁹，因此一行人才能暢行無阻地進入迪化街，甚至能夠「倒車停妥」。《美人捲珠簾》的這條車行路線，是現在已無法重複的軌跡，當時的日常生活與情形，也在小說情節的文字敘述中被保存。

筆者從而發現早期推理小說中趨近地方的方式，雖常透過日常生活與當時景觀連結在地經驗，進而凸顯文本中的在地性，而在《美人捲珠簾》中，更強化與歷史記憶的連結；意即有緻茶室這個「場所」便與周遭的城市環境產生緊密的連結，使得地方有了明確的內涵與意義，也避免了地理空間的同質化。

在這些討論中，筆者認為「本格復興」前、後對「本土」界義的不同，即在於「可／不可替代性」的表現上，《悲傷回憶書》將「本土」視作一種元素或物件，可以「附加」的方式置入或與推理敘事結合，表顯在台灣推理小說的「本土推理」發展中的意義，事實上是一種「本土」的「推理」；但「本土」的意涵，勢必基於「在地」實踐的基礎，唯有文本與在地性緊密扣連，「地方」始能不被輕易替代，它才能夠具體地描繪出台灣本土的地域範圍，並反映推理敘事中所關切的社會議題；換言之，《悲傷回憶書》中的「本土」因為無法穩定地指涉出地方的獨特內涵，反而在附加、與推理小說結合的過程中，逐漸失去了「台灣推理」架構下重要的「本土」象徵意義。

五、結論

台灣推理小說的「本土化」傾向，及其本土界義，反映在「本土」這個詞

⁶⁹ 1995年「變更迪化街寬度案」中止後，台北市政府在經濟發展考量與文化觀光的政策下，於1996年試辦「年貨大街」，因為反映熱烈，迪化街一、二段遂配合改為單行道，以紓解停車與交通問題。

彙所指涉的政治意義；意即在文體、形製上，歐美與日本的推理書寫，深刻影響著台灣推理小說的創作路線與書寫意旨，而藉由本土性與台灣的環境和意識的緊密鏈結，恰好形成了對歐美或日本推理傳統的某種對抗——台灣本土推理的作品中只要富含台灣的特殊性，就能夠與外來推理產生區隔。

本文藉由「本格復興」前的台灣本土推理小說的代表著作《美人捲珠簾》，以及「本格復興」後，以本格推理型態，獲得標舉「地方」特色與內涵的南瀛文學獎的《悲傷回憶書》，兩部作品表現出對「台灣本土」的界義、想像與在地性實踐的差異為開展，探究台灣推理小說發展歷程中不同的在地性思考。

《美人捲珠簾》通過小說人物國籍身分與國家間歷史事實的辯證與對照，以「本土／異地」的觀點界定出台灣本土的地域範圍，使得推理小說中的在地性實踐，緊密扣連著「地方」的敘寫型態；《悲傷回憶書》中的外籍身分，卻成為一種人物的附加設定，而未被深化與台灣地域性的聯繫；除此之外，新聞報導的剪裁與置入，雖然具有召喚讀者記憶與情境的作用，但由於其敘事始終沒有真正與地方精神相互連結，反而作為一種敘事的背景，因此顯現出這個範圍的不穩定與可替代性。這樣的書寫方式的隱憂，即是小說中的「台南」實際上並未反映真實的在地經驗，使得「台南」這個地方變得可以替換，因而無法透過「地方」扣連「台灣本土」，反而形成「台灣推理」中在地性失落的弔詭。

另一方面，《美人捲珠簾》透過建構場所的位置，以及建築物內部擺設與外在環境的落差，連結人們對於日常生活的價值認同與選擇，強化人與地方的緊密扣連；《悲傷回憶書》則積極地以對鄉野空間的恐懼，營造出場所環境與氛圍的詭奇，雖增添了推理敘事的懸疑性，卻反而讓地理空間的實質意義陷入同質化的想像。

《悲傷回憶書》雖以城市巷弄街道為座標、偵探的步行足跡為路線，一步一步解謎、破案的書寫策略，意圖讓地理空間具有實際的「本土」指涉意義，使得原本同質的地理空間，在小說中更為具體被劃定與呈顯。但是在小說的敘事軸線中，「地方」並不是真正被關切的焦點，以致於這些應該具有指涉或象徵

「本土」的場景或物件，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它們與本土的關係或連結，主要依賴的是偵探（作者）個人主觀的觀察（設定），通常使之成為一種背景的存在，使得小說敘事之背景雖然明確地被設定於本土情境中，卻產生某種消失的本土的弔詭；反觀《美人捲珠簾》從車行路線的敘寫中，凸顯了具有表現在地特性、文化與歷史情境的地景或場所，進而結合個體或群體的日常性經驗，回觀或反向地建構在地圖像，豐植了推理小說中的本土意涵。

《美人捲珠簾》與《悲傷回憶書》的創作時間相隔 23 年，在台灣推理小說發展史中，分別位於此文類在台灣發展之開端，以及 2000 年後以「本格復興」作為典範價值重構之進程，各自具有當時主流文學場域下關於創作背景等推理敘事實踐之意義；時間之差異，固然可能造成作品創作內容、風格上的不同，但放置於台灣推理小說的在地化歷程中，事實上也得以具體對應出不同的典範價值下，關於「地方」、「本土」意涵想像與界定的承繼與殊異。

「本格復興」後，當代台灣推理小說的書寫走向，雖逐漸以譯寫「本格」為主，但在「台灣推理」的架構下，這些推理敘事仍同時涵括了表現台灣地理空間範圍的「地域性」，以及反映台灣社會現實與價值的「社會性」，即台灣推理的在地化歷程並未因「本格復興」的呼聲而斷裂，因此台灣推理在未來的發展中，如何能夠藉由「本土」走出歐美、日本推理經典的制約與影響，創造自身文類的主體性，也都是台灣推理文學研究中必須持續關注的議題。

徵引文獻

公文檔案：

台北市政府，〈府工二字第 43828 號〉，1977 年 10 月 18 日。

小說文本

冷言，《鎧甲館事件》，台北：泰電電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杜文靖，《情繭》，台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

林立坤，《悲傷回憶書》，新營：台南縣政府，2007。

林佛兒，《島嶼謀殺案》，台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

林佛兒，《美人捲珠簾》，台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既晴，《病態》，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

既晴，《超能殺人基因》，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5。

陳嘉振，《布袋戲殺人事件》，台北：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溫瑞安，《殺人》，台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

專書

陳國偉，《越境與譯徑——當代台灣推理小說的身體翻譯與跨國生成》，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3。

陳國偉，《類型風景——戰後台灣大眾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

湯熙勇主編，《台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2。

黃淑清編，《台北市路街史》，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85。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出版社，2012。

趙莒玲，《台北城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3。

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Culture Geography*）。台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Yi-Fu Tuan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台北：國立編譯館，1999。

Appadurai, Arjun, *Glob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Relph, Edward,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論文與報章評論

〈第一屆林佛兒推理小說創作獎總評會議〉，收入思婷等著，《林佛兒推理小說獎作品集 1》，台北：林白出版社，1989。

〈第二屆林佛兒推理小說創作獎總評會議〉，收入余心樂等著，《林佛兒推理小說獎作品集 2》，台北：林白出版社，1990。

向陽，〈推之，理之，定位之——序林崇漢推理小說集「收藏家的情人」〉，收入林崇漢，《收藏家的情人》，台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

杜文靖，〈走入大眾文學之路——「情繭」出版前的禱文〉，收入，《情繭》(台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

林佛兒〈主編記事〉，《推理》第 23 期，1986.9。

林佛兒，〈四百年來一片空白——推理小說在台灣的困境〉，《推理》第 83 期，1991.9。

林佛兒，〈我的推理小說之路〉，《文訊》第 270 期，2008.4。

邱貴芬，〈尋找「台灣性」：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的基進政治意義〉，《中外文學》第 32 卷第 4 期，2003.9。

思婷，〈弄斧號子〉，《推理》第 45 期 (1988.7)。

既晴採訪，〈島田莊司訪談錄〉，《皇冠》第 617 期，2005.7。

島崎博，〈推理小說在台灣(下)〉，《推理》第 25 期，1986.11。

陳澄州整理，〈推理小說在台灣——傅博與林佛兒的對話〉，《文訊》第 269 期，2008.3

陳國偉，〈本土推理百年孤寂——台灣推理小說發展概論〉，《文訊》第 269 期，2008.3。

黃鈞浩，〈寫實型本格派之創作典範——解剖台上的，《情繭》〉，《推理》第38期，1987.12。

楊照，〈「缺乏明確動機……」——評台灣本土推理小說〉，收入氏作《文學的原像》，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

葉石濤，〈評《美人捲珠簾》〉，《推理》第34期，1987.8。

Schmid, David, 'Imagining Safe Urban Space: The Contribution of Detective Fiction to Radical Geography', *Antipode*, 27(3), 1995.

Agnew, John, 'Space and Place', in J. Agnew and D. Livingstone ed. *The Sage 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London: Sage, 2011.

學位論文

力宏勳，《男同志的意象——台灣在地性的視野》，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何京津，《從「鄉土」到「在地」——論90年代以降新世代鄉土小說》，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呂淳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林宛儀，《王禎和小說語言的流動性與在地性》，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9。

詹閔旭，《跨界地方認同政治：李永平小說（1968-1998）與台灣鄉土文學脈絡》，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7。

網路資料

「島田老師對本格推理的定義」，第一屆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網站，網址：

http://www.crown.com.tw/no22/SHIMADA/S1_a.html。(2014/9/28 作者讀取)